

反思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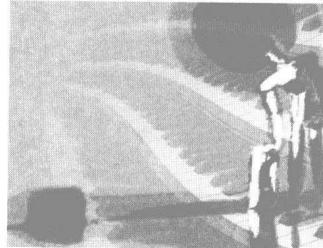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编

Reflection

中国社会科学

反思

第一辑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编

Reflec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第一辑)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61 - 1054 - 6

I . ①反… II . ①吉… III . ①哲学理论—文集 IV . ①B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846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曜

责任校对 王应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思》编委会

主任 孙正聿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成 王振林 王跃新 王福生
元永浩 孙利天 李大强 李海峰
张连良 张 盾 沈亚生 贺 来
姚大志 葛鲁嘉 程 彪 韩志伟
漆 思

Andrew Irvine(加拿大)成中英(美国)

David Mclellan(英国)Gerhard Zecha(奥地利)

主编 贺 来

副主编 漆 思

编辑部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立 王庆丰 王福生 李大强
李晓红 曲红梅 杨 晓 贺 来
韩志伟 翟奎凤

目 录

哲学的自我反思

孙正聿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	(3)
刘福森	哲学观:我们该如何对待哲学?	(11)
贺 来	“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主题	(27)
王天成	论中西形而上学的实现方式	(38)

时代问题的哲学反思

孙利天	我们如何走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的自身毁灭的危险 ——回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评论	(51)
张 盾	财产权批判的政治观念与历史方法	(61)
漆 思	现代性的主体主义理念批判	(77)
邵汉明 陈姝宏	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与思考	(90)
王庆丰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101)

道德与政治哲学研究

姚大志	原初状态的推理?	(117)
杰哈德·泽查(曲红梅译)	伦理学专业规范的哲学基础 ——兼论商业伦理学	(129)
韩志伟 倪 娜	反思的现代性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个维度	(141)

朱万润 论零值关系?

——基于契约论的权利证明 (154)

经典与诠释**劳伦斯·肯尼迪·施密特(李大强译)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

批判的可能性 (173)

华 军 张连良 经典与阅读

——寻求传统经典理解范式的突破 (188)

动态与书评**杨 晓 创造我们时代的概念**

——第八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述评 (199)

晋运锋 论古典契约主义对道德原则的证明

——评大卫·高希尔的《同意的道德》 (203)

博士生论坛**王 英 不可跨越的知性**

——论辩证逻辑与黑格尔的四个判断 (217)

刘立东 “有与无”:形而上学之根本困惑

——海德格尔的“本有”道路与黑格尔的“精神”进程 (229)

李 娟 如果你是革命者,为何拒绝同情?

——论阿伦特的政治本体论 (242)

哲学的自我反思

◆孙正聿◆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

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哲学命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同样，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命题的诘难和反驳，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倡言或批判“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命题就是如此。

批判“哲学就是哲学史”，其针对性和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哲学研究应当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回应现实，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感和创造性的思想，而不是钻进故纸堆中当“秦二世”；然而，被批判的“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否亦有其针对性和积极意义？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具体言之，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专业地研究哲学？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能否离开哲学史而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这是讨论这个命题的症结之所在。

一 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专业地研究哲学？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有两层涵义：其一，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其二，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在于哲学活动中的“历史”与“思想”的内在关联。

哲学是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所形成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与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和所思考的人类性问题密不可分。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总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又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与时代的特征和潮流，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就此而言，全部的哲学都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而非超历史性的思想。

哲学本身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由古往今来的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就是思想性的历史。这个思想性的历史，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历史，是“高尚心灵更迭”的历史，是“时代精神变革”的历史。它以哲学史的形式展现了“历史性的思想”，展现了这些“历史性的思想”所思考和求索的问题，展现了这些“历史性的思想”所提供的后人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因而构成哲学发展的“阶梯”和“支撑点”。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研究，都必须借助于这个“阶梯”或“支撑点”；离开这个“阶梯”和“支撑点”，无论怎样的“天才”都无法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攀登和前行。

在论述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曾经一再强调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最宏伟的形式总结了全部哲学发展，是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黑格尔的每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正因如此，恩格斯明确地提出，“每个人都天生地具有理论思维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和培养的，可是迄今为止，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还没有别的办法”；恩格斯还“预警”式地提出，“由于对哲学史的不熟悉，人们往往把几百年前就已经废弃了的哲学命题，当作全新的时髦的东西拿了出来”；恩格斯又针对“坏的时髦哲学”指出，“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由此，恩格斯又以结论性的论断提出，所谓辩证的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哲学史作为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历史性的思想——都不是某个哲学家的“独白”，而是哲学家之间的“历时态”的和“同时态”的“对话”。离开哲学“对话”的哲学“独白”是不存在的，而哲学“对话”的前提是了解、熟悉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的思想”。探讨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不以哲学史——思想性的历史——为前提，这种“探讨”都会由于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而把某种“历史性的思想”当作“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甚至把早已“被废弃了的哲学命题”，“当作全新的时髦的东西拿了出来”。正因如此，在研究任何一个哲学问题时，以“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中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的思想”（哲学）为“背景”或“参照系”，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前提。

尽管人们在自己的思想活动中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哲学名词，但是，这些哲学名词对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和非专业的哲学爱好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说，这些哲学名词是积淀着全部哲学史——“思想性的历史”的概念，是研究哲学的“阶梯”和“支撑点”。对于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这些哲学名词则往往是离开“思想性的历史”的名称，难以构成哲学思考的“阶梯”和“支撑点”。例如关于“哲学”，在专业性的哲学研究中，并不是某种给定的“定义”，并不是某种僵化的“结论”，而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多样化的理解和解释，需要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思考“哲学”本身，因而“哲学”才构成批判反思的对象。与此相反，在非专业的哲学爱好中，“哲学”往往是一个给定的“定义”和僵化的“结论”，因而只能是从这种“定义”或“结论”出发去思考哲学。阅读一篇或一部非专业的“哲学”论文或著作，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其论点是“独创的”，其论据却是“教科书的”，其论证则是“独白”的和“不能追问”的。这种惊人相似的根源，就在于这种非专业的论者不了解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史，缺少进行哲学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仅是非专业的哲学爱好者，甚至是一些“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同样是以这种“非专业”的方式进行“专业”的哲学研究。因此，真正地理解“哲学”和“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从而把哲学史作为哲学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是倡言“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最为明确和最为直接的针对性。

二 能否离开哲学史而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

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是以占有理论为前提的；对于哲学来说，所谓的“理论”并不是某种或某些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由“历史性的思想”（哲学）所构成的“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离开由“历史性的思想”所构成的“思想性的历史”，就失去了面向现实的哲学，因而也就无法（无力）达到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

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所取得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人们对“现实”

的理解和解释，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负载”着理论。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在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中究竟“渗透”和“负载”着什么样的“理论”？是一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还是某种“过时”的或“褊狭”的或“独创”的理论？对于哲学来说，它究竟是一种以“思想性的历史”为“阶梯”和“支撑点”所形成的“历史性的思想”，还是某种离开“思想性的历史”而形成的“非历史性的思想”？

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主要是“经验”和“理论”这两种基本方式。理论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不仅以“经验”为中介，而且以“理论”本身为中介，因此理论地把握现实，总是与现实之间具有并保持一定的“间距”。正是由于这种“间距”，理论才能超越黑格尔所批评的“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即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面对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和理智地反思现实，才能实现哲学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才能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对当前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和批评中，对“脱离现实”的批评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面向现实”，即究竟是以“经验”方式还是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却往往是被人们忽视甚至是忽略的。直面哲学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以研究“现实”之名，其实是在非哲学的层面上提出、思考和回答问题，也就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提出、思考和回答问题。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缺少哲学研究的“阶梯”和“支撑点”，缺少真正的理论思维和艰苦的理论探索，把“现实”变成“数据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因而无法（无力）对“现实”作出应有的理论把握。例如，究竟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离开“思想性的历史”、特别是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能否真实地达到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中国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中国问题”，我们就会十分亲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所提供的“历史性的思想”的巨大的理论力量。马克思认为，区分一个历史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马克思提出，市

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指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现代哲学的任务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所理解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的上述的“历史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观察和把握“现实”，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科学发展观，理解和解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解和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的“理论”中介作用吗？或者反过来说，离开这种“历史性的思想”，离开这种理论的中介作用，我们又如何去观察和把握“现实”？“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不只是要“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而且必须是以哲学的方式“面向”世界、现代化和未来，从而在哲学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中国的现实，塑造和引导中国的未来。

三 能否离开哲学史而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获取理论资源，一是发现理论困难。这两个前提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获取相应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发现相应的理论困难；只有发现相应的理论困难，才能活化相应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获取理论资源和发现理论困难的双重互动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

哲学创新的艰难，首先在于哲学必须以理论方式把握到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个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构成的社会制度问题、政治理想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思潮问题，使得哲学总是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标准与选择之间、必然与自由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徘徊。这种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既不能凭借某个人的“体验”和“思辨”来回答，也不能依靠“数据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来论证，而只有运用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以积淀着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思想性的历史”，才能在哲学的

层面上达到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深层的理解、全面的把握和批判性的反思，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离开以“思想性的历史”为“阶梯”和“支撑点”的“哲学创新”，既经受不住“思想性的历史”的追问，也经受不住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诘难。

哲学创新的艰难，又在于哲学对时代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困难”，而且取决于各种理论之间的“内部困难”。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这些各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图”和“目的”，总是经由哲学家的思维着的头脑而构成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不同的哲学，并从而成为人们观察和把握现实的相互冲突的理论。离开对相互冲突的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反思，就会只把某种“历史性的思想”作为观察所负载的理论，从而失去理论创新的批判力。例如，当代哲学在讨论特别关切的“正义”问题时，不仅不能回避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这些哲学家的论著，不仅不能绕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这些哲学思潮，而且不能不面对这些哲学论著和哲学思潮中的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再到康德、黑格尔的“幽灵”。一个中国学者探讨这个问题时，不仅不能回避这些西方的“幽灵”，更无法回避从孔孟、老庄到朱熹、王阳明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幽灵”。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须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离开这些理论资源，离开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反思，就不能深刻地提出问题和探索问题，当然也就谈不到哲学创新了。

哲学创新的艰难，还在于发现理论资源中的真正的理论困难，从而以新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这些理论困难。哲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地发现和解决这些理论困难的进程中实现的。离开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史，离开这个“思想性的历史”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阶梯”和“支撑点”，离开对“思想性的历史”中所蕴含的真正的理论困难的发现，所谓的“哲学创新”是不真实的。发现真实的理论困难，不仅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文献积累”，更需要持久的、艰辛的“思想积累”，消化理论资源、活化理论资源、突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理论资源。理论资源的突破口，就是理论资源中的真正的理论困难。例如，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钻研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深切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的理论困难，从而创建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马克思认为，“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神秘的”，不仅是由于他把思维过程当作“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且是由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①；恩格斯提出，“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的黑格尔辩证法^②，之所以“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是因为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即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只是发生了一场“睡帽中的革命”；列宁则从“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这种理论视野出发，揭示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根源，即“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③。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真切地获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资源，真实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困难，并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面向现实，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形态”的、“革命的和批判的”辩证法——“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凸显对“哲学史”的研究，更不是要以“历史”冲淡乃至代替“现实”和“未来”，而是把“哲学”合理地理解为“历史性的思想”即不是把哲学当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史”合理地理解为“思想性的历史”即不是把哲学史当成人罗列、文本的堆砌和“厮杀的战场”。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创新“思想性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③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就此而言，只有理解“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历史性的思想”构成“思想性的历史”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才能达到这个命题的批评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与未来。这需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深长思之。

◆ 刘福森 ◆

哲学观：我们该如何对待哲学？

一 哲学观：不是知识，而是态度

研究哲学观，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历史上每一个哲学家在讲自己的哲学之前，都首先要谈“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并且都认为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而且是哲学观的首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关系着我们对整个哲学观的不同理解，关系着诸如对哲学与文化、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哲学是什么”问题的提问方式是一个知识论的提问方式。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也都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论的问题给予回答。作为这些哲学家的晚辈，我们研究哲学时也都把这个问题看作知识论的问题并当作知识论的问题来回答，提出了各种解答方案，得出了各种结论。但是，无论是那些历史上的大哲学家还是我们这些晚辈，从来就没有得出过统一的答案，在哲学观领域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上，“哲学战争”始终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无论人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如何的回答，人们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却很少做出理论上的考察。因此，研究哲学观本身，我们首先不是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做出某种回答，而是要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作一番考察。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也必然是盲目的和无效的。

任何现实存在的哲学都是有个性的“特殊”哲学：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哲学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不同哲学家个人的哲学也是各不相同的。哲学史上的形态、范式和观念各异的哲学，都是具有个性的“特殊”哲学。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哲学不仅提出了各不同的哲学